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考

杨磊鑫, 叶荣国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需要明晰几个前提性问题。一是在“为什么结合”的思考中明确“第二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要求,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科学诉求,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需求。二是在“什么是结合”的思考中明确“第二个结合”的本质规定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并在二者互相成就中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是在“为什么能够结合”的思考中明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品质特性维度的相通、相融、相符是“第二个结合”的内在可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 6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86/j.cnki.1673-2618.2023.05.00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始终凭借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即“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对“两个结合”作了系统论述,并将“两个结合”上升到“两个必须结合”的高度。相比于“第一个结合”的经典表述,“第二个结合”无疑是党的理论新思考和任务新指向,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现代回应。为了坚持好、运用好“第二个结合”,必须在学理上厘清“为什么结合”“什么是结合”“为什么能够结合”的逻辑规定。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利于精准锚定“第二个结合”的机制、方向和空间,进

而在“真理与文化”双重伟力的持续迸发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为什么结合:“第二个结合”的现实语境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接续性、深入性、全新性认识。那为何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准勾连、相互作用呢?理解这一问题需要置身于“第二个结合”的现实语境中。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邂逅于后者难以挽救民族危亡、进而实现现代转型之际,但这绝不意味着二者的割裂与排斥,也不意味着传统

收稿日期:2023-09-23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思政建设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安徽师范大学)”(21SZJS34010370)

第一作者简介:杨磊鑫(1999—),男,山西临汾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mail:ylx05030@163.com

文化的离场和被淘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向来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地位和催化作用。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534}他随即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其得以实现“在中国具体化”，而具备突出连续性和包容性、始终涵养和塑造中国人民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需要的“民族形式”。随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时再次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同时告诫我们不能做“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只有“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2]707}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总结共产国际解散的教训时首次明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318-319}，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指导思想上的正式聚合，是“第二个结合”的雏形。现如今，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凝练出“第二个结合”，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途径或者说文化途径的规范认识和准确定位。

中国共产党习惯以“飞跃”来标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次伟大创新，可以说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助力。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找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真正的平衡，即所谓的“文化适应性调整”^[4]。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立足中国文化视野，毫不动摇地坚持“第二个结合”。

（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科学诉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长流不息、熠熠生辉的完整历史链条。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理性审视，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5]25}。但是，小农经济、封建伦理、封闭地域等特定的时空背景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

避免地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要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必须有科学的介入，或者说是科学性引导和改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文明”相互协调、“两种力量”共同增强的现代化，内在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深义和任务要求。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传统”和“现代”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但不是绝对割裂的关系。文化领域同样如此，“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根基，“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赓续，这不仅是在时间意义上对文化更易的朴素观照，更意味着传统文化能够适应新的文明形态，在历史与时代的呼唤中实现内在机理的改变，况且“现代化”本身就具有“更科学”之意，中华文明本身也具有“创新性”之特性。因此，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挖掘、承扬、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指引与嵌入。

“第二个结合”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6]。只有坚持“第二个结合”，才能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进而匡正其体系结构，延展其边界，拓展其形式，实现传统文化向“科学性文化”“现代性文化”的转化，为深入推进“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提供强大的文化力量。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需求

西方现代化的先入为主为西方国家输出“现代化=西方化”提供了话语先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西方国家在先行创造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矛盾、冲突、对抗的现代化历史，即“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7]406}。“现代化=西方化”难以自圆其说。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借鉴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是兼具科学性与民族性的现代化新路好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8]22}。这里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为基于社

会发展状况的现实考量,更表现为历久弥新的文化底蕴与价值观念。同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复兴,中华精神文化的强盛繁荣既是复兴之内涵,也是复兴之伟力,“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5}。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可以说是一部“两个结合”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凭借“两个结合”找到的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之路,是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崛起的壮丽征程。

“第二个结合”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重要逻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主动的精神力量和科学的理论指导。聚焦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21}的历史使命,“第二个结合”能够在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属性和特色的过程中,筑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权,进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原生恒久的动力支持和坚实有力的价值支撑。

二、什么是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本质规定

“第二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新理论洞见和价值判断,是对“第一个结合”的内化、具化、深化,不仅具有强有力的现实必然性,而且意蕴深刻,在双向互动式的命题结构中体现为以下三重规定。

(一)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近代以来,面对由西方文明冲击所导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困境,无数仁人志士先后对西方的“器物”和“制度”进行了求索移植,但都以失败告终。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在屡次碰壁中逐渐认识到,“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9]138},思想文化的觉醒才是中国的出路。于是,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并激烈演进,不同思想流派接续而起,并在“古今中西之辩”中形成了各自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立场。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各路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预见始终在保守与激进的两极震荡中反复横跳。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在严守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以向下兼容的姿态对

西方文化进行选择性吸收和主观性诠释,承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滑向“文化复古论”和“文化决定论”的窠臼。文化激进主义则秉持“全盘西化论”,一方面将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和由衰转盛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将西方文化视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智慧向导”和“价值遵循”,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文化观。

而与保守和激进两种极端思维相异,中国共产党允执厥中,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入中国文化的机理之中,构建了平衡稳健的中国文化发展之路,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逐渐走深走实,尽管受到一些挑战,但这没有且也不能改变马克思主义挽救了中国文化命运的历史事实。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0]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文化内涵、文化力量才得以构建、丰富和彰显。

(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

民族性,本义上是指作为人类群体生存方式和范围的民族所具有的价值特性,也包括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历史依据和各种现实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意义上而言,民族性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本土化的过程中被赋予的民族特点和所呈现的民族样式,其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跨文化传播、跨体系构建、跨地域实践的过程中如何拥有民族身份,并形成的独特发展动力^[11]。可以说,“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及其应用实现从一般到具体、从普遍到特殊的“中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应然样态和必然环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8]18}。“历史”和“群众”两个基础归根到底是一个基础——民族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最具民族特点和历史先进性的意识形态资源,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滋养了中国人民的主要思维方式和主流价值追求,比如“和合思维”“中庸之道”“仁爱精神”

“大同理想”等。而这些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历史中生发成型的观念立场和理论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高度的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表达和民族实践提供了抓手和空间。通过“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在中华民族这一具体空间内立足,才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理论。

所以,只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洞察、接纳、转化、升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形成具有民族禀赋、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一民族空间内的“否定之否定”,进而运用这一理论进行“化中国”的实践,这才算完成了毛泽东所言的“消化食物的过程”。

(三)在二者互相成就中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6]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指“由中华民族主体在现代世界的时空范围内所形成的文明体系和所创造出的文明进步成果”^[12]。

从文明体系维度出发,“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耦合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相成就中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逻辑。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基”和“本源”。在中华文明的整体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成了中华文明连续统一体,前者在历史的激荡中凝练蜕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来处”。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灵魂”。回望人类现代文明史,马克思主义在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标定了“为人类求解放”的文明新指向,并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文明新形态,铸就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品性^[13]。最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6],这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躯体”,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呈现样态和建设平台。

总的来说,“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建构机制。“文明是实践的事情”^{[14]97},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创造一种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明。因此,在新的文化使命召唤下,“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6],更好地为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培根铸魂立体”,是“第二个结合”的本质与职责所在。

三、为什么能够结合:“第二个结合”的内在可能

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第二个结合”之时明确了“结合”的对象,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基本原理”的限定,另一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加以“优秀”的规定,对结合对象规范的同时包含了对彼此之间存在高度契合性的内在肯定。

(一)思维方式相通

第一,“阴阳相生”“和而不同”是“对立统一”的朴素表达。马克思主义将“对立统一规律”置于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地位,正如马克思认识到,矛盾双方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14]605}是辩证运动的展开逻辑;恩格斯也反向强调“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15]127}。而古老的东方文明也孕育了独特的“对立统一智慧”,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这就是说阴阳两面相反相成,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矛盾,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中实现自身的升华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另外,史伯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认为事物的发展在于解决矛盾,实现和谐,这与孔子主张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万物一体”“因果相依”是“普遍联系”的原初体认。恩格斯曾将思虑至于天地之间感叹道:“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5]23}而这幅“辩证图景”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也得到同样审视与绘就。一方面,道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对天地万物的普遍观

照中形成了“一体共生”式的联系观。另一方面,佛家重因果,《杂阿含经》中所言的“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道出了“联系”的精髓,这就是说事物此时此处的存在和发生决定了彼时彼处的存在和发生。所以,“福祸相依”“义利之辩”“心物一元”等观点和学说都是“中国传统联系观”的体现和诠释。

第三,“变易哲学”“生生之道”是“运动发展”的传统释义。运动发展与直观静止的相对本质上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相对。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14]528}恩格斯同样将世界定义为“过程的集合体”,认为处于“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的事物终将会实现“前进的发展”^{[16]250}。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变易”“生生”具有共通性,《周易·系辞下》指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以各种卦象变幻说明世间万事万物都在运动恒变之中,所以才会有“生生之谓易”的传统认识。

(二)价值理念相融

其一,在价值取向方面,“以民为本”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相对照。马克思曾批判资本的逻辑造成了“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10},人的主体性逐渐被消解。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15]310}。于是,使人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追求,只有在真正自由的状态下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藏富于民”“敬德保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等民本思想相契合,尽管后者不乏一定的王权主义色彩,但突出强调的爱民亲民、利民富民、安民顺民等理念也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其二,在生态观念方面,“天人合一”与“彻底的自然主义”相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直接明了地将“自然地理环境”界定为“社会存在”的要素之一,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

体”^{[14]161},主张在合理的物质变换中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7]24}。这一论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同频共振。中国先哲在“天人一体”的认知中构建了“人道”与“天道”相统一的生态伦理体系,“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周书·泰誓》)同样肯定了自然的先在性、客观性和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周易·乾》指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这就是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只有遵循“规律”,把握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度”,才会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其三,在天下愿景方面,“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相辉映。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浓缩在共产主义构想之中。在那里,国家、分工、异化、私有制等一切旧社会的东西统统消失,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充分涌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647}得以切实实现。这与中华民族一向追求的“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殊途同归。“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大同社会所畅想的社会文明和谐、互助友爱与人人各尽其才、各得其所等,与共产主义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所以孙中山才会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7]832}的认识。尽管相比于建立在科学和生产高度发达之上的共产主义,大同理想有着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是,二者对“公有”“正义”“富裕”“文明”等理想社会样态的一致追求构成了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所必需的共同心理基础,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三)品质特性相符

首先,二者共蕴兼收并蓄的包容秉性。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精华的集大成者,不仅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18]309},而且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寻求智慧启迪。另外,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的普及更是如此,与苏联文化、中国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指导人类解放的新思想,是其包容性的真实展现。同时,包容性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根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造就了文化盛世;唐宋时期,“三教合流”逐渐成形,“治身治心治世”相统一治理范式也随之形成。可见,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多元文化交织的历史

环境中,开放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贯风格,这种文化秉性造就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兼收并蓄。

其次,二者同具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体两面,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品格,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6]⁶⁶⁴,《共产党宣言》也郑重强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7]⁴¹⁴。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的本土化实质上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化。中华民族也是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格物致知”“经世致用”,“致知”是为了“致用”,“中庸之道”“随事而制”“执两用中”等都是中国传统实践智慧。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发展的实践顺序,中国知识分子也一向背负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实践使命。由此可见,浓厚的实践精神是“第二

个结合”的前提,实践本身更是“结合”展开的场域。

最后,二者皆备与时俱进的创新特质。“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主义对“创新”的认识和表达,也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每一次发展的必然过程。列宁告诫我们不能“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19]²⁷,所谓“活”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历史的持续推进中和面对各国的固有差异时,与时俱进,吸取新的文明成果,生成新的理论,始终保持自身的科学性。早在中国商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成为君王警句;《周易·杂卦》同样指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也都是多家学说精髓相融而成的“新学”。可见,崇新尚新、推陈出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品质和擅长之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有的敢于创新、乐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无畏品格和进取精神是二者相结合的主动因素,也是结合不断深入的内驱动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20[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4]王玉鹏.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元素及启示[J].社会科学家,2016(9):27-31.
- [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6]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9]陈独秀.陈独秀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0]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1]付春,陈兰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民族性探析:以本土化为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21(12):36-43.
- [12]何哲.如何理解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异同? [N].学习时报,2023-07-10(4).
- [13]臧峰宇.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22(7):39-55.
-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7]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18]列宁.列宁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9]列宁.列宁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刘惊雷)